

目 录

改革开放 强国之路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
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问题	9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经济改革	13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17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	22
开放与发展的中国经济	35
持续发展的中国商机	38
中国的经济改革、结构调整与稳定	45

漫话市场经济

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都要善于运用	55
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	65
论市场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	68
市场配置资源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71
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75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1
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87
深圳要率先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	91
要注意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96

产权与股份制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在产权理论上有所突破	103
所有制结构与经济改革	111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117
论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	120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129
如何看待现代企业制度	132
我国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	136
深化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142

国有资产重组探索

要对国有经济进行重新定位和战略性改组	147
如何理解和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	154
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157
国有企业重组和债务重组的几个问题	173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80
加快国有专业银行体制向商业银行的转变	188

要素市场和社会保障

积极发展要素市场 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193
----------------------------	-----

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与动向	201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	211
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	218
从实际出发，逐步使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	224
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232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对策	239
进一步培育和建设粮食市场体系	243
打破地区封锁 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245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248

农村与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	257
重视农民利益 深化农村经济改革	260
市场化改革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65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产品流通体制	270
深化农村改革 搞好县域经济	276

香港经济及其他

联系汇率制度与香港的平稳过渡	281
香港国际经济中心地位有待加强	289

• 4

• 市场经济与中国改革

发挥内地与香港的优势	294
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	299
香港在中国未来经济中的作用	308
加强海峡两岸合作 促进东北亚经济发展	315
加强转轨型经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321

改革开放 强国之路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小平同志对改革历来很重视，把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过去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是第二次革命。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既然要解放生产力，就要清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当然，改革这样的革命与过去的革命不同，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而过去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既然是一次革命，就不是光对原来的体制修修补补，完善完善而已。正像江泽民同志所讲的：“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我们原来的认识没有提到这样的高度，有的甚至认为原来的经济体制也可以，加以完善就可以了。”

原来的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后期形成的，这个体制主要是按照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模式拿过来的，当然也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管理体制，也有解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但主要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这个体制在工业化初期，在我们建设 156 个重点工程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像第一汽车厂、鞍钢这样的项目，就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建设的，光靠一个地方是不可能的，靠集中体制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这是不能抹煞的。

同时，这样的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它的主要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管得过死、过多，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因为企业的计划由国家调配，产品由国家定价和包销，利润由国家收走，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二是忽视价值规律，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三是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四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单一化。经过改革，对这种体制的弊端我们的认识逐步有所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这种体制的弊病就开始暴露出来。我举几个实例来说明。

例如：洛阳拖拉机厂 1956 年就建成了，这个厂的上级——第一机械工业部就把部门管的大批施工队伍调到别的地方去，而另一些厂，如洛阳纺织厂（由纺织部管），黄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要建设的时候又由这些部从别的地方调来大量施工队伍，而且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大量的往返调动。当时建筑工人对此意见很大，埋怨说“牛打天下，马坐殿。”“我们辛辛苦苦干完了，又走了，老是住工棚。”一个大型企业的建设，大量施工队伍要调动，加上附属设施，加上家属，造成很大的浪费，影响了施工队伍的稳定，影响了业务素质的提高。本来这样的事城市可以管起来，城市可以调整施工队伍，发挥协调功能，但当时都要由中央部门管理。

再举个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冶炼厂，一个是电缆

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冶炼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而电缆厂需要的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运输上、时间上的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订合同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当时不行，要听北京的。这样的体制当时就暴露出了弊病。

我当时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发现每天有一千多人到部里要求解决问题。缺电了找你，缺煤了找你，没有任务找你，产品销不出去找你，缺人了也找你，什么都找你，都要批。下去调查时，企业厂长反应也很强烈，他们说，厂长也好当，你上级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完成就行了，至于产品销得出去销不出去我都不管，赚钱、亏本我也不管。企业没有自主权，连买打字机、盖个厕所都要审批，这怎么行呀！回来以后我写了个调查研究报告，题目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我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因为加了“一定”两个字，但当时，就是用“一定的自主权”也是不简单的，有人不同意，说企业怎么能有自主权，企业就是政府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有了自主权不就成了南斯拉夫了，因为当时说南斯拉夫搞企业自治，就是搞修正主义。但是我的这个报告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有个画家配了幅漫画，画的是企业要买打字机，就派人到北京，中央部门有关领导的桌上一大堆文件。漫画可以是夸张的，但这个漫画反映了当时的事实，因为什么都要审批，当然领导批阅的文件就多了。这样的体制，使企业不可能发挥创造性、积极性，造成了官僚主义，造成了大量浪费，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实际上，这个问题党中央、毛主席早就发现了，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就讲了，其中“两个关系”讲了体制问题，

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个是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一切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和企业卡得死死的，不给企业留点余地、留点利益，恐怕不妥。毛主席还说，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提出，上级机关往往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他又指出，中央部门应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应当把不该管的事情管起来。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经讨论过，搞了三个文件，一个叫《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第二个是《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第三个叫《关于改进财政体制的决定》。这三个文件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以国务院名义发了，是1957年发下去的，但是被“大跃进”冲掉了。后来经过困难时期和调整时期，刚好转，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改革是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在这以前，对原来的体制做了些调整，总是在你管还是我管上做文章，但还不能算改革，还未找到正确的目标和途径。只是在“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一统又死”的圈子里循环，跳不出旧体制的框框。由于体制上的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个体制不改就没有出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把改革提到议程上来了，按照扩大企业自主权，从企业、市场、宏观管理这三个环节进行配套改革。改革以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我们的经济发展加快了，1979年到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8.7%，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要高出6个百分点，比改革以前也高出3个多百分点，这是很大的变化；第二，综合国力增强，因为改革

以后，生产发展加快了，实力增强了，我们不少产品产量在国际上所占的位置提前了，比重增大了，国力增强了；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中国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跟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提高，那就很难说了。苏联解体，有种种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僵化的经济体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以后提出要搞改革，但只是纸上谈兵，老百姓没得到实惠，所以它们解体不是偶然的。

中国改革以后，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影响扩大了，国际上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了，到中国来了解、考察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了。举一个例子来说，两年前，世界银行派以副行长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考察，以决定是否恢复对中国的贷款问题，他们是带着中国改革是否停下来的问题来考察的。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说明改革并没有停下来。对于这一点他们听进去了，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价格改革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他们说，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推进，对于总量基本平衡的商品，我们采取放开的办法；其他商品我们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他们主张一步放开的办法，理由是既然是短缺的，那么你放开价格以后，大家不就都来投资了吗？投资以后，供给不就增加了吗？供给增加了，当然就不短缺了。我说，根据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步到位风险很大，所以我们采取分步走的办法。因为有些十分短缺的能源、原材料，如石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的建设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资金需要比较多；第二，生产建设周期比较长；第三，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价格一步放开，供给未能跟上，很容易造成物价的混乱，所以我们还得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当时他们

不赞成这个办法。不久，这个副行长又来了，他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在国际上有的国家采取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或叫“电击疗法”，震荡很大，造成很大的混乱。

现在，一些国家、国际机构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的评价越来越高了。后来，我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专门去讲中国的改革，去了以后他们很重视，三个副总理、九个部长会见了，还到两个大学去讲，回来之前他们又把政府管经济的官员集中起来，让我讲中国是怎么搞改革开放的。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他一些国家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中国介绍这方面的情况。90年代初，我曾经会见俄罗斯滨海地区的行政长官、叶利钦总统的代表，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司令，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独联体、俄罗斯应当吸取中国的经验。所以他们要求双方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中国派专家到他们那里去讲中国的改革。现在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多了。

总之，从我们历史上来看，从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看，都说明了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惟一的出路。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中国要想富强起来，就必须改革开放，除此以外没有出路。

(1992年6月)

改革开放： 姓“资”姓“社”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姓“资”姓“社”的三条标准：一、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三、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要有利于这三个方面的，我们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本来是个开创性的事业，在改革试验中，到底什么是“资”，什么是“社”，一下子弄不清楚，等几年、几十年，弄清楚后，不是耽误时间了吗？所以，小平同志提出三条标准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往往困扰着我们搞改革开放，变成了拦路虎。不去考虑是不是“三个有利于”，而是按照某种模式、某种名词去争论或衡量姓“资”姓“社”，是不利于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我认为在这个方面，过去有几个界限不清楚。

第一，本来不姓“社”的，但作为姓“社”来固守。

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吃了很多亏，比如说“大锅饭”、平均主义，本来不姓“社”。社会主义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搞平均主义，劳动不好的人得到的报酬跟劳动好的人一样，这不是剥削人家了吗？这怎么叫社会主义呢？这叫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固守。现在提出要改革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完全是正确的，它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东西。

再比如说我们曾经实行过的指令性计划，统购统销，实物分配，但实行过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并不能说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指令性计划只是一种形式。过去有人说，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等于指令性计划，于是指令性计划就等于社会主义。实际上指令性计划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指令性计划理论上有个缺陷，认为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利益就一体化了，没有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可以通过指令性计划、靠实物分配来配置资源。现在我们利益多元化了，靠指令性计划，就不适应了。我在1987年提出，计划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可以用经济合同、用国家订货来代替指令性计划。后来这个建议在十三大报告中被吸收。并不是说搞指令性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不搞指令性计划就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道理。这是一个界限。

第二，本来姓“社”不姓“资”的，但往往把它作为姓“资”来批判。

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农民把劳动与成果相联系，完成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搞改革开放，兴办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强国富民之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

主义是错误的。

第三，本来既不姓“资”，又不姓“社”，是中性的东西，但被资本主义所采用。

股份制就是这样的。有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是同私有化相联系的，是“私有化潜行”。现在大家认识到，股份制是企业资产的一种组织管理形式，这种形式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也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它是中性的，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当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搞股份制我们还缺乏经验，所以不能一哄而起。再比如说市场，本来不是姓“资”的，但被等同于资本主义了。认为搞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出了错误无所谓，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出了问题不得了。因此在市场面前有恐惧症。

第四，本来是姓“资”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也要借鉴、利用、吸收。外国资本当然姓“资”了，但是因为姓“资”我们就一概排斥，行吗？不行！为什么我们要利用外资、搞三资企业呢？有人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越多，资本主义就越多”。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我们利用外资，办三资企业，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法律约束下。第一，利用外资有利于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第二，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进来了，有利于吸收先进技术；第三，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劳动力大量富余，就业问题压力很大，办三资企业，就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相应地得到工资报酬；第四，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第五，搞三资企业我们得到了信息，有利于开辟国际市

场。这就是说，姓“资”的东西不能盲目排斥，对我们有用的也可以拿来为姓“社”的服务，所以我们应当大胆地利用外资、办三资企业。当然也不能是盲目的，没有条件也不行，借外资也要考虑还本付息，搞三资企业要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不能盲目发展。

第五，本来姓“资”的，也可以加以舍取，改姓为“社”。

我们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经营方式和方法，有的跟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劳动的结晶，这个我们应当大胆地利用。只有这样，我们社会主义才可以搞得更快一点。有的管理方法虽跟剥削制度相联系，但也要作分析，比如说“泰勒制”，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和剥削相联系的管理方法。列宁对这个管理方法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他说：“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我们过去不够大胆，思想不够解放，主要在这五个界限上没有划清。这几个界限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学习、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就可以在较高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可以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势。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经济改革

经过 18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发展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但是，无可讳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见突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成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障碍因素之一。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使政府职能转变尽快到位，是完成“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发展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前提。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予以正视和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发展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致力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

201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转变，体制转变是基础和前提，没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能是一句空话。

大家知道，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思路，由易到难、由点到面、逐层推进，表层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现在的改革则要解决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体制问题和企业制度创新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这些问题作为长期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与我国建国以来的政治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 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发挥作用，排除市场的作用，没有竞争和市场主体。

2. 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政府以部门为主直接管理经济，造成部门林立、机构庞大且结构不合理，条块分割影响了专业化协作和统一市场的形成。

3. 权力过于集中，包括干部人事制度、财力和物资、技术的分配等等。

4. 政治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薄弱，党政不分。

这些问题经过必要改革虽然有所改观，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未有根本性变革。为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作重大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关键是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来是比较好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96年GDP较上年增长9.7%，粮食再获大丰收，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基本适度，物价上涨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外贸形势转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